

方誌記事技巧

巧

张伯齡

鄭正西

編著

方志記事技巧

黃山書社

责任编辑：沙宗复

方志记事技巧

张伯龄 郑正西 编著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

广西区党委凤凰印刷厂印刷
(南宁市七星路118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565 字数：125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0

书号：ISBN 7-80535-083-3/K·27 定价：2.00元

目 录

第一讲 选 材	(1)
一、目的性.....	(1)
二、思想性.....	(3)
三、真实性与实质牲.....	(5)
四、典型性.....	(6)
五、时代性.....	(7)
六、地方性.....	(8)
七、规律性.....	(10)
八、针对性.....	(11)
第二讲 结 构	(13)
一、“三股头”结构法.....	(13)
二、“三股头”之间的关系.....	(19)
第三讲 章 法	(23)
一、直书其事的基本要求.....	(23)
二、方志章法的种种禁戒.....	(24)
1、戒夹叙夹议，附加评论.....	(25)

2、戒传授知识，形同教材	(26)
3、戒汇报工作，写成总结	(28)
4、戒浓施脂粉，写成散文	(30)
5、戒引经据典，或解释标题	(31)
6、戒附加导语，概括正文	(32)
第四讲 寓 意	(34)
一、选词法	(34)
二、对比法	(36)
三、暗示法	(38)
四、点睛法	(39)
五、剖析法	(42)
六、算帐法	(43)
七、引用法	(44)
八、因果法	(46)
九、以此寓彼法	(46)
第五讲 竖 写	(49)
一、竖写的基本要求	(49)
1、依时顺叙	(49)
2、记事单一	(50)
3、叙事完整	(51)
二、竖写的方法	(52)
1、分期法	(53)
2、编年法	(58)
3、始末法	(58)
4、钩玄法	(60)

第六讲 深 度	(63)
一、“深”与“浅”种种	(63)
二、记事深度的基本方法	(65)
1、“由表及里”法	(65)
2、层层剖析法	(67)
3、横向“攀亲”法	(68)
4、“因果照应”法	(70)
5、运用“参照系”法	(73)
第七讲 背 景	(75)
一、背景和条件	(75)
二、如何记述背景	(77)
1、客观排比	(78)
2、专门揭示	(78)
3、自然揉合	(79)
4、一笔带过	(80)
5、另附旁证	(81)
第八讲 概 括	(83)
一、几种类型的概括	(85)
1、概括的事实	(85)
2、概括的数字	(86)
3、概括的语言	(86)
二、概括的要领	(87)
1、只下断语，不引例证	(87)
2、只勾轮廓，不画工笔	(89)
3、列陈数据，归纳点题	(89)
4、划分阶段，由始及末	(90)

5、统览全局，高瞻远瞩	(91)
6、同项合并，集分为总	(91)
7、引用谣谚，提纲挈领	(92)
第九讲 计数	(94)
一、数据与方志	(94)
二、如何运用数据	(95)
1、戒报表搬家，要有目的性	(95)
2、戒随意取舍，务求客观性	(96)
3、戒偶然因素，重在代表性	(97)
4、戒概念模糊，确保准确性	(98)
5、戒自相矛盾，保持统一性	(100)
6、戒涵义不一，保持可比性	(100)
7、戒以偏代全，要有综合性	(102)
8、戒囫囵吞枣，要有分析性	(102)
9、戒死板堆砌，力求生动性	(103)
第十讲 引用	(107)
一、引用的作用	(107)
1、述史事	(107)
2、点关键	(108)
3、明是非	(109)
4、寓褒贬	(109)
二、引用的技巧	(109)
1、诸法并用，避免千篇一律	(110)
2、改变角度，避免褒贬失当	(111)
3、文言加释，避免文白夹杂	(113)
第十一讲 角度	(115)

一、选择角度的基本原则	(115)
二、单一内容的记事角度	(116)
1、立意的角度	(117)
2、选材的角度	(118)
3、叙述的角度	(119)
4、用语的角度	(120)
三、交叉内容的记事角度	(121)
1、各归各业，不超越专志界线	(121)
2、分清主次，不允许重复雷同	(122)
3、口径一致，不出现相互矛盾	(124)
4、彼此衔接，不有害相辅相成	(125)
第十二讲 图 表	(127)
一、图照	(127)
1、地图的运用	(128)
2、插画的运用	(129)
3、运用插画注意事项	(131)
4、照片的运用	(131)
二、表列	(133)
1、表的种类和作用	(133)
2、表的制作要点	(134)
3、防止几种偏向	(137)
三、图、表、文的关系	(140)
第十三讲 语 言	(142)
一、方志语言的特点	(142)
二、讲究语法，求简洁流畅	(142)
1、用词的禁忌	(143)

2、词语的锤炼	(146)
3、用句的禁忌	(147)
4、句式的选择	(149)
三、讲究修辞，求生动精雅	(156)
1、排比	(157)
2、比喻	(158)
3、韵律	(159)
四、讲究逻辑，求准确严谨	(160)
1、正确使用概念	(161)
2、正确使用判断	(162)
3、正确使用推理	(163)
五、模糊语言的运用	(164)
1、模糊语言在方志中的特殊作用	(164)
2、模糊语言的适用范围	(165)
结语	(169)

第一讲 选 材

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是说的无米不成炊。不过，进而言之，欲想做成“美炊”，除了有米之外，还要有“巧妇”。修志也一样，没有资料不可修志，但有了资料，不善于选材，也是写不好志书的。

志书的选材不能孤而论之，它是受修志的指导思想，志书的性质、功用，以及体例特点制约的。这好比举办一个展览会，首先要明确展览的宗旨、作用、目的，还有场地的可容量，等等，方可决定选取哪些展品，不选取哪些展品。

那么，志书的选材如何进行呢？至少要把握以下几个要点。

一、目的性

这里说的目的性，不是泛指编修方志的目的，而是专指选材的目的，即材料要为中心思想服务，要体现明确的编写意图，不带盲目性和随意性。

有一部《政法志》选载了这样一个案例：1946年11月9日，当地有两个刑事犯图财害命，在荒郊佛山堂打死一名外地商人。案发后，凶手赵生桂、张振功被陕甘宁边区政府判处死刑。其中，张振功要求参军，“杀敌立功”，居然此人被批准入伍。

边区政府的这种处理是否正确，姑且置之不论。我们这

里只说，这样选择资料，显然不妥当。因为选取这个案例，缺乏明确的目的性。在《政法志》编选案例，只能选录那些有教育意义、借鉴意义或反映出政权性质的案例。不能猎奇，不能追求趣味。这个例子并无积极意义，相反，只能说明人民军队中也曾有杀人越货的刑事犯。简直是志稿在思想内容上的错误。

下面是一部县志的《党派群团志》中，关于一次党代会的记载：

中国共产党××县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60年2月10日至11日在县城人民会场召开。当时全县有党员4728人，选举代表354人。大会是在持续“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形势下召开的。正式代表缺席116人，加上列席代表本应出席540人，实际仅出席351人……

编写者选取这些材料，目的性很清楚。这段记述在材料的安排上突出了两点：一是大会在10日至11日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开完了；二是大会在正式代表缺席三分之一还多的情况下就召开了。如此草率从事，可见在“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形势下召开的这次党代会，民主作风被践踏到了何等地步！志稿还摘引了几句这次党代会的《工作报告》中的内容，如“全民整风”、“大办钢铁”、“人民公社化”、“反右倾”中的“巨大辉煌的成就”，“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对富裕农民反改造批判不力”，“要从党内到党外，把持有严重富裕农民思想倾向、与党离心离德的党员、干部清洗出去”等等。编者摘引这些材料，对这次党代会的褒贬态度是十分鲜明的。

以上两例说明，在选用史料时，编者一定要思索：入志材料作什么用？能不能起到这个作用？

二、思想性

选材的思想性与选材的目的性密切相关，但二者不完全等同。选材的思想性重在强调材料所表达的立场、观点。

例如，清末修的《山东通志》载：

顺治七年，河决荆隆口，溃张秋堤，入大清河，漂溺东、兖、济三府沿河州县。

这里记述了黄河决口的时间、地点、灾害的范围。而对黄河决堤的原因未作记载，东、兖、济三府沿河州县人民受害情况如何也只字未提。选材很简单，略去了反映事物本质的材料。

大学士王熙在他写的《骠骑将军张胆传》中，就对这次决堤的原因作了揭示。他说，决堤是三省总督张有仁指使张胆干的。张有仁为什么指使张胆决黄河大堤呢？王渔洋在他的《居易录》中记载：因为当时鲁西南，苏、鲁、冀、豫边区数十县有抗清的军队活动，这些抗清的武装力量在这些地方利用遍地榆园的自然条件，掘地道，出没其中，使清军屡遭挫败。所以，张有仁指使张胆决荆隆口黄河大堤，去灌淹榆园地道，消灭抗清武装。

被康熙文字狱所害的戴名士在他的《南山集》中，记述了决河后人民受害的情景。他说，张胆决堤，不仅淹了榆园抗清武装，还淹了十几县人民。为此，张胆民愤太深，只好去职。

对顺治七年荆隆口黄河决堤的不同记述，可以看出两点：一是选用什么材料，是由编修人的立场观点决定的。二是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的选材，是不一样的。《山东通志》只记决堤时间、地点，水淹范围，不记决堤原因、后

果，充分表现了其编纂者偏袒清王朝的立场和观点；而王渔洋、戴名士的选材和记述，却表明了他们揭露、批判清王朝残害平民百姓的立场和观点。

入志资料要具有思想性，还在于修志人员用什么眼光去识别材料。同样一条史料，我们对它认识不同，用法不同，取舍也就不同。例如，湖北江陵县教育志的编写同志，从一本旧文献中找到关于记载1905年至1920年间，江陵劝学所为“学田”打官司的资料。他们在选用这条史料时，经过了这样三个回合：

开始，只认为这是一件平常的词讼材料，只摘抄了其中有关清末民初江陵劝学所所长的姓名和学堂洲田等情况。

之后，认识深了一步，感到这份材料反映了当时劝学所和县知事对学产的重视，很有价值。因此，将该件全文抄录，用来编写了这样一条大事记：“一九〇五年，江陵学堂洲洲头严宗富及佃户二十余人抗交学田课租，县学务公所呈请正堂严办。县正堂即下硃票拘拿洲头严宗富。”

最后，他们在深入分析这条史料后发现，当时的劝学所与佃户之间的关系应是：劝学所拥有五千多亩学田，拥有六百三十五家佃户，又有官府作后台，可算是一家财大势大的地主，它与佃户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明确了这一认识之后，原写大事记就不符合历史真实情况了。于是，他们将大事记改写成：“江陵学堂洲头严宗富及佃户二十余人，因学务公所擅自加收洲田课租，便群起抗租。县正堂即下硃票拘拿洲头严宗富。是为学田佃户为反抗学界士绅的剥削而进行的最早的一次抗租斗争。”

以上一例说明，同样是一条史料，赋予的认识和思想性不同，选材方法是不一样的。

三、真实性与实质性的关系

志属信史，必须实事求是，求实存真。志稿所用的材料，必须是真实而可信的。但真实不等于可信。有的事情，确是客观存在，然而从实质上看，并不是客观真实的反映，选用时必须着眼于其实质。

有一部政事志记述“破四旧”时这样写道：

1966年11月3日，××大专院校8个学生来县，……之后，各种“群众组织”遍布各乡各镇。同年12月，在“四清”工作队的发动和组织下，破“四旧”、立“四新”达到高潮，不少文物横遭破坏。

这段记述是真实的，但未能反映出实质。志稿把“不少文物横遭破坏”的责任归于“四清”工作队，归于“四清”工作队的发动和组织，就是只看到现象，没看到本质。“四清”工作队参与并组织“群众组织”（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这是表象。在这表象后面，本质的、起支配作用的因素，是当时的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不少文物横遭破坏，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的必然结果。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因此，在选用这一史料时，不能不把当时“文化大革命”这一重大事实一起反映出来。这才是既求其实，又存其真。

有些修志人员以为，入志资料只要有出处（根据）就行了。其实不然。例如某市，在解放前夕，城内有各种中等学校22所，而解放后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却只有12所中等学校。后来通过进一步查实、分析，即“由表及里”，才掌握了事物的真象：该市解放前夕有22所中等学校，是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为了加强它的内战力量，大量征兵，规定除了

在校青年学生不征兵之外，其余都在征兵之列。许多人家为了逃避抓壮丁，把适龄儿子送进城里的中学读书，学校成了躲壮丁的安全港。当时的初中生中，有很多是20岁开外，结了婚，生了孩子的人。显然，这样的学校数目虽多，但并不说明当时教育事业发展。解放后到1986年，尽管中等学校只有12所，但在校学生均是12~19岁的青少年。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学校。

以上说明，在修志工作中，搜集资料难，但分析、选用资料更难。一般来说，凡是遇到那些“反常”、“突变”的资料或数据时，更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彻底弄清事物的真实全貌之后，方可决定取舍，从而作出正确记述。

四、典型性

入志资料首先要求真实，但真实的资料不是都要入志的。创作文艺作品十分讲究“典型”，修志不同于文艺创作，但同样也存在有“典型”的要求。否则，地方志便成了流水账。

如何从大量存在的同类事物中去发现典型事物，不能不说这是技巧问题。《光明日报》在报道关于当前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收入“倒挂”的不合理现象时，从大量的社会现实中，选取了这样一个典型事例：兄弟三人，老大大学毕业，老二中专毕业，老三小学文化。结果是，老三盖了一幢三层楼的房子；老二盖了一幢两层楼的房子，老大至今住的是父母留给他的一间平房。半句评论语也不需要，读者一目了然。就这说明，我们要学会“以一当十”的选材功夫。

在我们的志书（稿）中，也不乏其例。比如《武汉邮政志》写“文化大革命”不仅阻碍了武汉邮政事业的发展，而

且给武汉邮政事业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志稿选取的几个年份的资料，应当说是具有典型性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报纸发行量逐年下降，杂志几乎停发。1966年报纸期发21万份，杂志33万份，1969年减少到报纸期发14万份，杂志9605份。

1968年湘桂铁路阻断，武汉积存去广西地区邮件、报刊达百余吨。自7月1日起，由汉口包机一架飞南宁先后10次。

1977年武汉邮局收取的60具信箱，有21具没有门，另有4具已撤回，实际只有35具。

这些事实足以说明“文化大革命”对武汉邮政事业的破坏。因此，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宗旨是很鲜明的。

五、时代性

所谓今日志书的时代性，简而言之，就是要让读者开卷就感受到这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产物，是20世纪80年代的精神产品。

《如东县志》（初版本）在“人民生活”一章中选用了最新的典型调查材料，多角度地反映建国前后农村和城镇、农民和职工、全民和集体的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例如：

县城掘港1948年初解放时，三个居民小组150户人家收入情况和1980年该地区居民收入状况，以此反映同一地区不同时期居民生活的差异；

掘港12个有代表性的企业单位1980年职工月工资，列表标明单位性质、工资形式、最高工资、一般工资、最低工资和平均工资的金额，以此反映各单位之间职工工资的差别；

一个生活水平中等偏下，能勤俭持家的职工家庭1980年

每月支出情况，以此反映全县职工的生活状况；

一个农村生产大队1940年至1980年的全部住房及高档用品，列表每隔10年变化情况，以此反映全县农民改善居住条件和添置高档用品的发展变化情况。

在这部县志的修订本中，又加进了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材料，如1983年农民家庭平均每人收入（462.51元）经营所得的构成情况，1983年农民家庭平均每生活费支出（283.30元）的细目。

这些资料，从一定角度反映了一个历史阶段中人民生活的实际情况，时代性鲜明。这是选材上的技能。

方志选材要力求充分体现当今时代的改革这一主弦律。这个问题，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得清的。这里只从选材的角度讲，至少要注意这样几点：1、以“发展生产力”的标准选取反映改革的材料，重点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情况。2、选好典型材料，如实反映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意在进一步促进和完善改革（比如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后，水利管理中出现了一些纠纷和问题）。3、以唯物史观记述建国初期第一次大规模的全面改革，即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10年。这场改革巩固了新兴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出的成功的一步。4、以辩证的观点记述局部改革，即“一五”计划以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几年，有些单项改革应用辩证的观点予以肯定。总之，从以上角度进行选材，突出对改革的记述，赋予志书时代性。

六、地方性

地方性是地方志的主要特征之一。方志的选材要特别注

意地方性，这是不言而喻的。如《什邡县志》中为晒烟单独立志，并在农业、工业、商业、财税等分志中，都十分注意选入有关晒烟的生产、加工、流通、经济效益等方面的资料。

《如东县志》注意选用该县特有的近海资源的资料，形状述异，详加记载，特设渔业、盐业、沿海兴垦、潮汐、海涂等章节，使“沿海县”这一地方特色跃然纸上。再如萧山县的围垦达40余万亩，是全国围垦面积最多的县份之一。在围垦过程中，创造了抢潮围涂、沉井护坡、岸水密实、当年围当年垦种等经验，并且移民定居，在垦区建立了6个乡和几个规模较大的农场。垦区的农、林、牧、副、渔、工、商、教、科、文等事业都有较大发展，在全国颇有影响。所以，《萧山县志》单独设立《围垦编》，从钱塘江的河口段的历史演变和江涂的形成写起，再写历次围垦工程，一直写到垦区的开发和建设。

突出地方特色，当然不限于在门类的设置上，关键还在于体现对具体事物的记述。首要一步便是选材。即使对那些全省乃至全国共有的事物，也要着眼于选取在本地的独特表现的材料，即详独略同，或详史之略，略史之详，也是志书选材的重要原则之一。例如《玉山县志》人物传的第一篇写的是黄家驷，他是我国著名的医学家，是我国胸外科和生物医学工程的奠基人，生前曾任中国医科科学院院长、首都医科大学校长。对这样一个全国知名人物，作为他的家乡的县志，只应侧重取他求学之“材”。因此，这篇人物传，全文2400字，求学内容占了近一半文字。对他带领手术队赴抗美援朝前线，创办医科大学，主编《外科学》，出国考察等事迹，都是略写。这种取材方法，较好地突出了志书的地方特点，同时，与今后正史中的黄家驷传避免了不必要的重复内